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媒介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以南京市 S 村喇叭为例

陈逸雯 楼馨元 王丝语¹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喇叭在农村社区治理中依旧是广泛运用的媒介。为探究喇叭在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成效,对江苏省南京市 S 村进行田野调查,并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探讨喇叭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分析发现, S 村喇叭具有高覆盖性、高效能性的应用特征,在实际宣传中体现出权威与亲和并存的特点,增强了宣传内容的可接受性。同时, S 村喇叭的多样灵活应用也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的进入与作用情况。

【关键词】:农村治理 农村喇叭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 D422.6; G229.2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城镇化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城市化浪潮带来了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等人口问题,人口强流动性改变了村民传统的互动方式,并进而影响了村民自身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的构建。另一方面,多元文化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农村传统文化,削弱了传统乡风文明与风俗公约在农村社会的主导性,农村治理迎来新挑战。

其中,媒介作为重要的信息交流载体,其在农村传播应用中的迭代发展历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可视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治理变革的缩影,从大字报、宣传栏到喇叭、电视再到手机、电脑,农村媒介实现了单一渠道到多维方式、单方传递到双向交互的转型升级。而今,手机等便携移动工具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媒介工具,微信等社交平台也已广泛普及。但是,手机的私人性与娱乐性的特点使其在单对单互动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而难以在社区的规模治理中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因此,目前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呈现出新旧媒体共存的形态,部分传统媒介仍被广泛应用。其中,喇叭是农村媒介系统的主力军。

1 文献回顾

经历城乡一体化和新兴城镇化建设,农村出现重大变革,呈现出传统农村社区、整合后的新社区并存的局面,对于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1]。关于治理手段方面的转变,研究者提出要运用网络平台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通过信息技术、网络平台开展社区治理中的相关行动^[2]。

数字化新农村改造方向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化治理,搭建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从而进一步扩大信息的应用,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3]。在农村已有较长应用历史的喇叭系统也是社区公共信息平台搭建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农村喇叭应用模式也有所创新。研究者认为喇叭凭借安装快、覆盖广、效率高、获取信息便捷的优势,在人口分布较分散的农村仍然非常适用,即

¹作者简介:陈逸雯(2001—),女,福建安溪人,本科生在读。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202110307089)

使有线电视、手机逐渐兴起，广大农民对喇叭仍然情有独钟^[4]。

农村喇叭在 20 世纪已有普遍安装应用，为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对农村、农民的喇叭应用模式，“村村响”项目启动，农村喇叭体系集体更新换代。该工程通过丰富喇叭业务内容和技术升级、网点增设等多种方式实现传统媒体转型升级，起到了“三农”信息推广、突发事件应急、党群干群联系、思想文化宣传的积极作用^[5]。如辽宁省朝阳喇叭电台推出新农村喇叭节目“农事 110”，内容涵盖农产品实时市场价格和农业专家答疑解惑，契合农民生产需要^[6]；疫情期间，湖北清水村青年抗疫守卫队运用村委会喇叭、村民私人录音机与音响等宣传抗疫知识和防疫规范，有效发挥了应急喇叭的独特作用^[7]；安徽农村喇叭金牌栏目“金色田园”通过积极主动接入互联网，与微信、自媒体、网络在线直播、手机终端等融合，探索实现“喇叭+新媒体”的新路径^[8]。而在党建方面，一些地方开始依托“村村响”喇叭系统，创新党史宣传方式，探索以方言、戏曲等形式讲党史、分享党员故事，让当地百姓听得懂、易接受，推进党史学习“声”入人心^[9]。

纵观农村喇叭的发展历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有线广播网的建设热潮开始，农村喇叭就成为农村社会中的重要组成；到 80、90 年代经历了一段沉寂，再到当下喇叭集体更新换代，以升级了的传统媒介新面貌重新进入乡村社会场域。有学者认为，农村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角色转换，事实上这也是农村社区治理变革之路的缩影^[10]。其中，喇叭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从早期的政府象征发展为民生信息载体、商业广告方式、文化治理手段等的集合体，本来附着于喇叭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变迁中逐渐隐退。在新发展阶段，农村喇叭主要运用于农业信息传播和乡村文化、党建文化宣传，仍在乡村日常治理和应急状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智慧农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帮手。

本研究以南京市 S 村喇叭“乡音课堂”为例，分析探究农村喇叭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应用成效和作用机制。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在 S 村的参与式观察和对村领导、社工、村民的深度访谈。从 S 村喇叭的案例中，将对媒体在乡村社会的参与体现和治理功能进行初步分析与讨论。

2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媒介——以南京市 S 村“乡音课堂”为例

2.1 基本情况

S 村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一个村庄，位于城区东南侧。S 村在 2016 年组织成立社区居委会，社区下辖 6 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2248 人，其中老年人 574 人，小孩 36 人。村中青壮年职业以外出务工为主，因此村中多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近几年 S 村附近规划建设了新兴产业科技园，许多工厂落地，村中部分青壮年由外地务工转为在家门口打工上班，留守现象有所缓解。同时因当地美丽乡村建设引入旅游业，S 村的流动人口由几乎为零发展到了如今约 800 人。

2.2 S 村喇叭——“乡音课堂”

S 村喇叭共有 19 个，主控台设在村头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喇叭则散落分布在村落中的主干道和村民聚集地，每个自然村内部至少有 2 个喇叭，1 个喇叭覆盖范围能达到 40~50 户人家。

2018 年江宁区融媒体给下属村划统一安装升级了喇叭系统。8:00—8:30、17:00—17:30 由江宁区融媒体控制统一播放节目，节目涵盖音乐、文娱、新闻等。其他时段由 S 村控制，这时喇叭基本作用是应急广播，主要用于应急事项通知，如在疫情期间宣传防疫规范，周六日游客多时用于寻人寻物。2021 年 3 月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后，社区工作人员提议将此喇叭利用于向群众进行党史宣传教育。在街道和社区中老党员的支持下，社区开设了一项党史宣传节目——“乡音课堂”。

乡音课堂第一期在 2021 年 4 月 6 日上线，开播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的 10:00—10:15，形式为每个工作日邀请一位村中的老党员，用 S 村方言朗读党史教育相关内容，一周一轮换。嘉宾要求为思想觉悟高、配合工作、积极主动、在村民中地位高的党

员，目前有老村长、退休教师和前妇女主任等。考虑到选题的严肃性和专业性，讲稿材料由社区负责准备，从学习强国 APP 和统一发放的党史学习材料上摘抄整理讲稿内容。

2021 年 7 月，南京出现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此影响下党史宣传节目暂停播出。S 村的喇叭主要应用在疫情消息通报和防护规范宣传，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 1m 距离的防疫三条规范，除中午午休时间外每天不间断循环播放，一次 5min，间隔 20min。

3 农村社区治理中喇叭的应用

喇叭高覆盖和高效能的传播特性，天然适合农村的传播环境，是社区常态化治理和当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最具有传播效力的乡村媒介。通过与 10 位 S 村村民（3 位 S 村社区干部、1 位入驻 S 村的公益组织社工、6 位普通村民）的半结构性访谈以及在 S 村中的参与式观察，笔者对 S 村喇叭的应用成效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简单总结。

3.1 喇叭的特性

3.1.1 高覆盖性

喇叭在 S 村实现了全面覆盖，总共有 19 个喇叭分布在主要道路和村民聚集点，6 个自然村各自至少有 2 个喇叭。喇叭音量大、密度大，据村民介绍，1 个喇叭覆盖范围能达到 40~50 户人家，在房前屋后活动或是工作路上总会听见喇叭播放节目。

“我这个店门口就是一个喇叭，每天都播东西的。我们来上班就能听到，有人来买吃的也都听一听……一般跟客人拉家常时，喇叭在说话的时候就会讨论下喇叭里面的事。”（对熟食店张女士的访谈）

媒介的传播效果还与其接触成本有关。无线广播信息接收需要通过收音机，电视信息接收需要电视机，网络信息接收需要手机、电脑以及网络信号覆盖。农村喇叭则属于有线广播类型，设备架设及后期维护技术门槛低、成本低，同时耳朵就是天然的接收“设备”，不需要额外购买装置。因此，喇叭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媒介，这种经济性使其可以广泛应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

3.1.2 高效能性

在类似 S 村这样老龄化程度颇高的农村中，老年人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同时他们的视力也开始衰退，因此宣传栏、微信群、村庄微信公众号等视觉媒介上的信息对其影响力有限。而喇叭使用声音传递信息，认知难度低，在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相对较低的农村能更直接、更便捷地发挥作用。

“网格员在村微信群里面发村里新闻或者通知，像我们这样的中青年人看了，有什么大事回家就要把这上面的消息讲给老人。现在喇叭装上了就不用了，他们在家听得比我们清楚。”（对食杂店陈先生的访谈）

3.2 喇叭的作用机制

3.2.1 权威象征和亲切感

有线广播的技术特性使得其覆盖区域往往是一个有明显共同文化特征的地区，因此喇叭具有适应本地区风俗习惯和群众喜好的天然优势。喇叭的播音者大多生活在本村或就是本村人，与作为喇叭受众的村民们地理位置相近、心理距离很小，播音员的

乡音土话、对村庄的高熟悉度等乡土特性也能拉近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此外，作为乡村中的传统媒介，喇叭在诞生之初就具备有一种国家权力的隐喻，而这使其在目前仍是政府话语的象征，其权威性仍发挥着作用。喇叭的强烈地域特性和权力象征相交织，使其信息传播展现一种熟悉的亲和性和天然的说服力。

S 村“乡音课堂”采取了选拔优秀村民做播音员的方式，入选者都是在本村公认声望较高的人物，村民之间相互认识熟悉，也取得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我们公益组织正好有一个本村的志愿者，她也是乡音课堂播音员之一。在我们定期的公益服务中，她在跟那些孤寡老人拉家常的时候就很自豪在讲‘这期乡音课堂是我读的’，然后你就能看到她自己就会觉得很有社会价值和参与感。大家接着就会讨论，要去仔细听一听她讲的是什么；有小伙伴会觉得很羡慕，说原来这个（做播音员）没有这么遥远，然后也会觉得我也想努力去上这个节目。”（对驻村社工翟女士的访谈）

3.2.2 重复播放的强在场性

对人口密度小、分布不均的农村地区来说，喇叭物美价廉、成本低；特别是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需要反复强调防疫要求，使用喇叭播放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几乎为零，这有助于社区防疫工作展开，助推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经过重复播放后，喇叭的在场感被不断强化，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媒介，收听状况由单次收听、被动收听不断升级为多次收听和主动收听。在这个过程中，村民的信息接受度不断提高。

“之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面对面宣传的话，要人家有时间才能听的。比方他们双休日在做生意什么的，喇叭这个就不影响他的；或者说老人乘凉的时候顺便都能听一听的，能了解解放战争相关的事，特别是建党 100 周年。天天讲这些，说多了都能够了解多一些。”（对中共党员、退休教师邵女士的访谈）

“过去大家都不带口罩，有的老人素质差一点，倔得很，怎么说都不听的。这个喇叭天天讲反复讲，就说得大家都知道要戴口罩、回去消毒，也会互相监督的，那些老人也就戴起来了，这个还是有功效的。我觉得对，疫情下就是要一直说，过段时间不说大家又不注意了。”（对便利店宋女士的访谈）

4 媒介变迁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缩影

中国农村喇叭的发展历程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广播下乡”的扩散过程，是中国农民被逐渐融入现代传媒体系的过程，也是国家在乡村的改革和建设实践过程^[11]。伫立在广大农村的喇叭，自出现之初便是国家权力的隐喻。喇叭在当时传递的信息在性质上有着更浓烈的政治色彩，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向村民传达来自中央和上级政府的各级政策信息，完成不同时期的政治宣传任务。可以说在最初，喇叭便与国家意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一种象征，其日常应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乡村社会场域中国家权力的强势在场。这一时段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一元的，国家权力无所不包地控制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一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变。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大大丰富了村民获取信息的途径，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挤占了喇叭的媒介逻辑和生存空间。如今农村社会中的喇叭主要运用于农业信息传播、娱乐节目、乡村文化和党建文化宣传，也有一些行政通知，但总体上看，喇叭内容中政治宣传已大为减少。何钧力^[10]在华北米村的调研发现，当地喇叭出现了强烈的市场化倾向，喇叭在建设主体、承载内容上都演化为私人商家的广告载体，商业气息浓重；王华^[12]在对江苏明村的喇叭考察中发现当地出现了大量由农业经纪人私人建设的广播站，以此为自己的蔬菜收购打广告，甚至利用喇叭打起价格战、口水战。

在 S 村，喇叭虽仍属于公共媒介，但其政治色彩已大为减弱。村委通过“乡音课堂”这种宣讲形式进行党建宣传，以方言讲党史、身边党员讲党史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思政教育，其内在逻辑就是从学党史氛围创造的文化治理路径入手，发挥先

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此外，在 S 村 2020 年集体抗疫和后来的常态化抗疫中，喇叭在社区防疫动员、布置防疫工作、稳定社会秩序等多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再次显示了农村喇叭系统这种基层动员结构的成熟性和稳定性。作为国家动员基层的信息载体和媒介标志，喇叭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权力的重返和“择机进入”。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喇叭更多作为一种基层自治的媒介辅助手段，承载传播了社区工作人员结合本村实际情况所制定的防疫规范，从而帮助打通了基层抗疫宣传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集体防疫方面的成效更多是党领导下的村民组织所取得的。对私人搭建喇叭的默许和喇叭内容的多样化发展表明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对农村社区治理的直接控制权。此时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多元的，国家权力仅是村庄诸多权力主体中的一种。

5 总结与反思

农村喇叭系统作为传统媒介的一种，在技术升级提供的客观基础和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变迁带来的转型动力双重作用下，获得了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发展。

在新媒介自身的完善发展中，政府积极参与其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的铺开，“互联网+党建”“互联网+社区”的智慧农村治理方式逐渐铺开实践，同时带动了传统媒体的智慧应用，农村喇叭的多样化运用是其代表之一。农村喇叭系统有其自身的媒介逻辑和社会意义，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着纸质媒介、短视频媒介等所不能及的独特作用机制。但从其本身看，喇叭仍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受自上而下的权力意志所左右。在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创新治理模式是重要一环，喇叭的应用跟上数字化建设脚步，进一步提升喇叭体系的数字化、创新应用，尽可能发挥其亲民性、高效性，让内容精准找到受众，以及将其媒介逻辑嵌入乡村振兴发展中，让喇叭实现更有效地服务农村社区的宗旨，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胡建.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转型[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9(2): 54-62.
- [2] 张立伟.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 7 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J]. 行政论坛, 2019, 26(3): 44-50.
- [3] 陈荣卓, 刘亚楠. 共建共享: 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 2016(04): 106-113.
- [4] 王权武. 智能广播网欣然进农家[J]. 政策, 2013(8): 62-63.
- [5] 沈祥辉, 牟凡.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智能广播的社会传播功能——以恩施州农村智能广播为例[J]. 中国地市报人, 2021(9): 104-106.
- [6] 肖玉英, 王旭. 新农村广播用信息服务“三农”[J]. 新闻传播, 2011(11): 31.
- [7] 周孟杰, 吴玮. “青年抗疫守卫队”的媒介实践与社会行动——对一个湖北村庄的网络民族志研究[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6): 104-110.
- [8] 王承. 安徽农村广播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之路探讨[J]. 安徽农学通报, 2018, 24(18): 129-130.
- [9] 张福财. 九市一区融媒共同寻找福建“红”[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1-08-04(1).

-
- [10]何钧力. 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18(4)：2-16.
- [11]潘佼佼. 扩散、转型与流变：对中国广播发展历程的回溯[J]. 现代视听，2019(9)：5-8.
- [12]王华. 农村“高音喇叭”的权力隐喻[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31-38.